

中 · 华 · 文 · 史 · 资 · 料 · 精 · 华 · 本
百年文史写真书系



现代重大战役目击记

硝烟弹痕



近现代重大战役目击记

硝烟弹痕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硝烟弹痕：近现代重大战役目击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
委员会编.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1

ISBN 7-5034-1115-5

I. 硝… II. 全… III. ①战争史-世界-近代-史料
②战争史-世界-现代-史料 IV. E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83142 号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刷：北京市世界知识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0.875 字数：282 千字

印 数：3001—5000 册

版 次：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01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定 价：17.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出版说明

20 世纪去了，21 世纪来了。过去的世纪需要回顾，需要温习，新来的世纪应当展望，应当奋进。回顾是为了更好地展望，温习是为了进一步奋进。为了回顾，回顾上一世纪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沧桑巨变；为了温习，温习上一世纪中国先贤们的奋斗历程，我们选编了这套《百年文史写真书系》丛书。

这套丛书共分 8 册。分别是《硝烟弹痕》、《漩涡沉浮》、《机诈权变》、《淘金旧梦》、《文坛档案》、《学林碎影》、《丹青风骨》、《慈父遗爱》。书中的所有文章均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和各种专辑史料中选出，这里有军事、政治、经济，有文化、科学、艺术，所有文章都是历史当事者和见证人的回忆。这些回忆具有“亲历、亲见、亲闻”的特点，构成了 20 世纪活的历史。

编者

2001 年 1 月

FK45/10

目 录

1	中华革命军山东反袁战争亲历记	辜仁发
6	孙中山与张作霖联合反直纪要	宁 武
13	唐继尧回滇讨伐顾品珍亲历记	符昭骞
22	第二次直奉战争纪实	傅兴沛
30	张作霖击败郭松龄的经过	王之佑
57	追随孙中山北伐回帆录	龚师曾
77	田颂尧、刘文辉成都巷战记	何煜荣
87	二十九军在喜峰口的抗战	何基洋
94	古北口抗战纪要	杜聿明 郑洞国 章异之
108	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回帆 ... 蒋光鼐 蔡廷锴 戴戟	
121	百灵庙战役亲历记	孙长胜
124	八一三淞沪抗战回帆	龚传文
132	忻口战役追记	陈长捷



- 141 记豫东战没及黄河决堤 晏勋甫
- 145 台儿庄会战的片断回忆 张金照
- 150 桂林“焦土抗战”亲历记 巢 威 黄梦年
- 159 反攻昆仑关 韦 德
- 164 蒋军胡宗南部撤出延安的经过 陈子干
- 174 莱芜蒋军被歼记 王耀武
- 185 孟良崮战没回忆 罗文浪
- 191 辽沈战没实录 杜聿明
- 225 长春解放经过 龙国钧
- 239 淮海战没纪实 杜聿明
- 264 黄维第十二兵团被歼记 杨伯涛
- 300 天津战没亲历记 林伟俦
- 319 襄樊战没康泽被擒记 董益三
- 336 守卫南京的第四十五军被歼经过 喻天鉴

中华革命军山东反袁战争亲历记

事 仁 发

中华革命军山东反袁战争亲历记

1915年，窃国大盗袁世凯帝制自为，山东的中华革命军树起反袁义旗。我这时刚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受孙中山先生之命参加了这一战役。兹将其经过情况就记忆所及记录于下，以供史学界参考。

当中华革命军在山东发动反袁之前，吴大洲、薄子明到东京向孙中山报告，说：“山东组织起义，现在已有两三千人有把握，只要给我们一笔经费，马上就可发动。”孙问：“要多少钱呢？”吴大洲说：“至少要1000元。”孙说：“好吧，昨天南洋华侨才汇来1200元，你们就拿1000元去吧。”过了两天有人向孙说：“吴大洲等说的话靠不住，他们将钱拿到手在外面乱花。而我们在此生活都很困难，先生为什么轻易信他们的话受他们的骗呢？”孙说：“革命不怕受骗，也不怕失败。哪怕100件革命事业有99件失败，而只有一件成功，革命就可胜利。”言者语塞。我们当时在东京听人谈到这事，都被孙中山先生这种革命精神所感动。

山东中华革命军的反袁行动，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政府向中国积极侵



略的形势下进行的。当时，日本乘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帝国主义无力东顾的机会，出兵山东，打败德国驻军，抢占青岛及胶济铁路沿线等地。袁世凯正在进行帝制，面临这种严重关头，不但不敢抵抗日本侵略，反而无耻地划定莱州、龙口和接近胶州湾一带地区为德日两军交战区域，允许日本帝国主义在该区域内驻兵。当时山东都督是靳云鹏。日本军队以战胜德军的骄横姿态进兵济南，靳云鹏是不敢开罪日本的。

孙中山的主张是，不仅要打倒袁世凯，而且要恢复1912年的约法和1913年的国会，但是他的这一意图，山东的中华革命军因种种关系未能执行，以致于失败。

二

硝
烟
弹
痕

1915年春，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中国学生，有一大部分人参加了中华革命党，我也是其中之一。当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到东京时，留日学生都义愤填膺，在东京锦会馆开会表示反对，一致决议暂不承认，并推举代表三人回国请愿，坚决要求撤销这个亡国条约。开大会那天，正是星期日，士官学生例假外出，得有机会参加。我们参加大会的行动被士官学校当局知道了，要用违反校规的罪名（军事学校的学生不准参加集会）对我们加以处罚。我们与学校当局争辩，推代表到校长室说明校规是针对日本学生订的，不能约束我们不爱国，因此不能处罚，否则我们宁愿退学。校方坚决要罚，势成僵局。当代表向同学们宣告交涉经过时，我们正预备出操，大家激昂起来了，有几个同学将所佩腰刀从楼上甩到地下，表示抗议。区队长抓住这点，认为不爱护武器，说武器是日本天皇所授，也就是对天皇不敬，非要全体学生列队到天皇像前请罪赔礼不可。我们更不能接受，罢课罢操表示反对。校方将袁政府驻日公使陆宗輿及陆海军中国学生监督周春茂找来，对学生加以

压力。争执了两天，结果由两班学生各推代表一人到日皇像前行三鞠躬才算了事。

孙中山为了组织反袁武装力量，曾派夏重民、胡汉贤到美国招集了华侨敢死先锋队多人，集中到横滨进行短期训练。至1916年5月，居正、吴大洲在山东起义，这支先锋队即开到山东归居正指挥。

这年5月，我们士官第11期的学生21名毕业，经理学校（即军需学校）也有三名中国学生毕业。孙中山派周应时到学校动员同学们回国参加反袁工作，每人给了路费300元，指定了两个目的地，一是山东，一是贵州，由各人自行决定。愿到山东的有：许宝琮、辜仁发、陈鸿庆、杨澄源、张乃威、方城钺、李铁山等。愿到贵州的有：何应钦，朱绍良，谷正伦、张春浦，李毓华，王绳祖等。我们到山东的一批人，随同周应时先到上海，然后随同许崇智从海道到山东，受居正指挥。

中华革命党有鉴于以前的组织暴动和暗杀行动都遭失败，徒然牺牲了不少同志，因而有所转变，着重组织武装力量。居正、吴大洲在山东组织的武装力量有两部分：一是山东各县的民团，一是由尤民、夏绍虞等策动来的红胡子。这两部分的部队，所有枪械都是日本供应的。日本人还组织了一个野战医院，到山东支援革命军。

1916年春，山东的武装力量，组织工作已有成效。居正、吴大洲、薄子明、夏绍虞、邓天已等于5月4日在胶济铁路沿线各县发动起义，占领了潍县、高密、周村，打起反袁旗帜。居正号称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吴大洲为山东革命军的山东都督，薄子明为革命军东北军前敌总司令。总司令部设在潍县。前敌总司令部设在周村。这时山东半岛已在日本势力范围之内，周村以东并无北洋军。加以日军的暗中支持，所以革命军很容易地占领了各据点。这时集中起来的民团有两三千人，由辽东来的“红胡子”号称“五大团”的约有千余人。

5月7日，我们到潍县见到了居正和吴大洲，许崇智被推为中华革

命军东北军副总司令。我们这一伙初出茅庐的学生，分配在总司令部军事处工作。处长是夏绍虞。我管军械并筹设修械所。这是因为日本供应的枪械多数是坏的，供应的四门山炮是日俄战争时用过的旧炮，连表尺都没有，修理后才能使用。

革命军起义后，由于在日军势力范围内，北洋军第五师不敢开到胶东来，因而革命军很顺利地占领了昌乐、益都、博山、邹平、寿光、桓台等十余县。但是革命军内部不久发生了政见分歧，居正、许崇智遵照孙中山的指示，倒袁的目的不仅仅反对袁世凯称帝，还要恢复约法、恢复国会；军事行动不仅仅限于山东一省，而且要向东三省和福建发展。但是吴大洲、薄子明只主张反对袁世凯做皇帝，维护共和政体，而不管其他。因此，吴、薄二人脱离了中华革命军，跑到周村，分道扬镳，打起护国军的旗帜。吴自称护国军山东都督。薄自称护国军总司令。我们这批初经世面的青年人感到失望，都想走开。于是，杨澄源去了山西，许宝琮、方城钺去了安徽，张乃威去了贵州。只有我和陈鸿庆、李铁山仍留在山东工作。我是学炮兵的，奉命成立一个炮兵队，加紧组织训练，准备作战。这时居正已成为一个空头司令。

三

山东护国军有一部分约 1000 余人，于 5 月中旬到达济南附近时，“五大团”推进到了邹平以北。吴大洲、薄子明向驻在泰安的靳云鹏提出通牒，要他宣布独立反袁，否则就要进攻济南。靳云鹏鉴于日军暗中支持革命军，不便与革命军作对，怕引起中日纠纷，他自己的地位也将不保，乃采用缓兵之计，表示与护国军妥协。

当山东护国军与袁系部队对峙之时，5 月 15 日，居正以华侨敢死先锋队为骨干，组织了五六百人潜入济南，袭击将军署，牺牲了一部分

人，失败后退出。5月底，袁世凯调开靳云鹏，以张怀芝继任。护国军与靳云鹏所订妥协办法破灭了，6月4日，护国军派一部分兵力进攻济南，也失败退走。

山东护国军与中华革命军当时最感困难的是给养问题。而胶东各县在日军占领下，早已民穷财尽，无粮无饷可资征发，以致在周村一带的部队有一星期断粮。“五大团”则“自由行动”，到处抢劫，军纪荡然，百姓怨声载道。

孙中山见袁世凯已死，黎元洪已继任总统，段祺瑞当了国务总理，就首先撤销山东中华革命军，电黎、段派人收编，以示光明磊落大公无私。后段祺瑞派了他的亲信曲同丰到济南来点编部队，编为一师，自任师长。

居正、许崇智遵照孙中山意旨，把总司令部撤销，带着总部人员和华侨敢死先锋队由海路去上海。护国军由薄子明，“五大团”由尤民，与曲同丰接洽改编。曲阴谋将“五大团”缴械，准备将他们集合到邹平，派第五师包围强制执行。“五大团”的枪械马匹是他们自备的，不愿交出，意图抗拒。曲即将“五大团”团长赵得胜逮捕枪毙了，因而团众哗变，从蓬莱向辽东半岛溃逃，蓬莱被洗劫一空。山东护国军则接受曲同丰的改编，成为段祺瑞日后的政治资本。

吴大洲、薄子明将军队交出后，即到日本去了。尤民在“五大团”溃散后，取道津浦路南逃。曲同丰电驻徐州的张勋将尤逮捕，就地枪决。我与陈鸿庆回到上海，后转山西工作。以上就是山东反袁战争的大概。

孙中山与张作霖联合反直纪要

宁 武

硝
烟
弹
痕

1919年秋，我奉中山先生电召由福建到了上海。中山先生给我讲述了当前革命的新方略：“在国际上要联俄，学列宁的革命方法；在国内，五四运动正蓬勃发展，中国新青年起来了，这是中国革命的新血液、新生力量。我们要把握时机，取得政权，擒贼擒王，首先必须打倒北洋直系军阀。因此，我打算即回广东，重组政府，亲率大军北伐。另一方面，我们要分化北方军阀，利用直系与皖系的利害冲突，联络段祺瑞，特别是关外实力派张作霖，三方合作声讨曹（锟）、吴（佩孚）。”这就是当年所称的“三角联盟”，或“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合作”，也是中山先生的一种策略。接着中山先生指示我的任务：“你是东北人，派你回去做张作霖的工作。”

当天晚上，朱执信、张孟杰找我商量，才知道跟段祺瑞合作已有头绪了。与段祺瑞合作，当时是有不少人反对的。但中山先生却认为，段祺瑞反袁（世凯）称帝，不失为爱国的军人，可以和他联合；如果他跟我们革命到底更好，否则等我们有力量时再解决他。同志们也就没有话说了。关于如何和张作霖接上头的问题，我们几经研究的结果，根据确息，张作霖想找华侨投资开办葫芦岛海港，就决定拿这个题目作为进身

之阶，并分途进行准备工作。1920年夏，张作霖（时任东三省巡阅使）到天津参加“巡阅使会议”，我就带了华侨资本家的信息赴天津。

运用社会关系，经过不少周折，通过张景惠介绍，我和张作霖晤谈了两次。张作霖对华侨投资表示十分欢迎，坦白说出：“我要开办自己的葫芦岛海港，就是为抵制日本的大连港口，我们一定要办好这件事情。”我乘机说明：华侨投资是没有问题的。不过外面谣传直、皖两系又要动刀枪了，时局不定，华侨是不敢来的，因为他们不愿把钱往海里扔呵！又拐弯抹角扯了一阵，我开始试探说：“听说段祺瑞已和孙中山先生接洽好了，合力推翻曹、吴，如果各方面能协同动作，安定大局，华侨投资就好谈了。”张作霖就直率地问道：“这件事我也知道。我是带兵的，老粗，不懂政治，不过我很不明白：孙先生是开国元勋，著书立说，革命党怎能跟这路人（指段）合到一块儿？”我只有笼统地回答：“不论什么人，只要肯革命，孙先生是都可以合作的。”

张作霖离开天津的前一天，大概和幕僚计议过了，约我再去谈话，但仅含糊地表示，他已考虑过了，可以试试看。不久，奉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宋文林来转达张的话，大帅拟派少将副官张亚东带问候信同我去见孙先生，问我可不可以，我当然同意。

中山先生高兴地接见了张亚东，先讲了些革命的道理，然后指出：雨亭（张作霖的别号）在东北治理得很好。不过，外有日本帝制，处境是很艰难的；如果国家统一了，建立了革命的中央政府，地方的事就好办多了。这次是孙、张初次的直接联系，中山先生自不便多谈，也没有什么具体表示，只写了封简单的回信，交张亚东返奉复命。我则留天津静候下文。

这年秋间，张作霖来北京，派宋文林到津邀我去京会谈，在顺承王府见面。张作霖头一句话：“孙先生看得起我，我很高兴！”他一高兴就聊起天来了，谈到一件有趣的事，也可以看出他的个性。他发议论说：

“你离家乡多年了吧，应该回去看看我张某人把家乡弄得怎样？有个你的同县，这小子一向跟我过不去，也是个革命党，我不记前仇，你也可以叫他回来。”我问是谁。他笑着说：“同你一个姓——宁武。”（在辛亥革命以后，我已化名为宁孟言。）我只好撒个谎，说是我的本家，人早已死了。话还没有谈到正题，值日官报告曹锟来了。

后来听说，曹锟一进门就嚷：“雨亭老弟，咱们兄弟不错嘛，为什么要和孙文勾结打三哥（曹行三）呵？”张极力否认，劝曹不要听信外人的胡说八道。于是曹拿出杨庶堪、宋大章邮寄我的两信，信里牵涉到宋文林，作为证物。张也能随机应变，就把责任完全往宋身上一推，随即给张景惠打电话，臭骂一通，命令把宋文林扣押起来。张作霖敷衍曹锟走后，通知宋文林和我去见他。我担心张要变卦，又怕宋吃亏；而宋却认为这是大帅亲自交办的事，不要紧，我才放了心。我先向张作霖说明，我们往来的信都是由日本邮局寄发的，过去没有出过岔子。并告诉张，我们知道北京宪兵司令秦华和他们有关系，常派人监视革命党，他和日本也有勾搭，可能信是他从日本邮局偷出来的。张听了大怒：“他妈的做我的司令，跟别人干活，我要办这个小子。”最后他叮嘱我们，往后行事要严密点，免得惹出麻烦。又告我，这里有些不方便，请我去奉天再谈，他也马上要回去了。从张作霖的态度看来，曹锟这一闹一迫，虽把秘密揭穿，倒帮了个忙，起了促成的作用，不然，还不知要费多少时日、口舌才能正式提出合作问题呢？当然，张、曹间的权利之争是基本的东西。

1921年2月，我到沈阳，先和杨宇霆、张学良谈了，再去会张作霖。他明白表示：“现在国家成了个烂羊头。孙先生是开国元勋，谋国的办法，我想派人去向他请教一切。你可打电报去先联络一下。”后派定旅长李少白同我一路南下，并带去一本密电本。

在桂林大本营，我同李少白晋谒中山先生。中山先生问了东北情况

后，着重讲述了建设新中国的计划和开发北方港口的计划。李非常惊奇，表示五体投地的敬佩，因为他从来就没听说过有什么建国计划呵！我也曾向中山先生谈及我的看法：“张作霖对于革命二字是谈不到的，但对先生很敬仰，相信先生救国有办法，合作是可望成功的。”中山先生自然更清楚，不过在当时的环境下，不能不借外力配合北伐先击败曹、吴，打开个新的局面。所以中山先生即电上海伍朝枢代表他去东北联络，同时在交我们带给张作霖的复信中，也提出联合讨直的问题。

因为香港海员罢工，我们在香港等了一个礼拜的船。我亲眼看到家家户户放花爆，庆祝罢工胜利，很高兴。可是我忽见报载张作霖派代表某某赴桂林密商，拥护孙中山先生为大总统的消息，甚为惊讶，又出乱子了。到上海才知道是安福系政客造的谣，捣的鬼。我因事在天津停了一日，李少白先回奉天。

张作霖一见李少白，不容分辩就破口大骂：“谁派你他妈的代表，我只叫你去送信，你胆敢说我拥护孙文做大总统?!”马上又命杨宇霆发电报不承认李是代表和他所说的话。张作霖又自言自语：“南边人我们斗不了，什么合作，算了罢。”我第二天到了，得悉上述情形，知道张作霖有了误会，不能不作解释，就去看他。他余怒未消，先说了一大篇话：

“李少白这杂种，胡说我拥护孙文做大总统，岂有此理！”

“现在是共和国，你们革命党明明知道总统是选出来的，不是我张某一个人说了就成啦，为什么要登报造谣言？”

“伍朝枢这个年轻人，还实在，肯说老实话。他告诉我：两广遍地是匪，孙文没有力量北伐，至少几个月内办不到。

“我和曹锟是儿女亲家。他想做大总统，出卖东三省，我就不答应！他对英国公使说，他上了台，京奉铁路的借款合同可以延长。再对日本公使说，他上了台，二十一条也可以考虑。我姓张的就不赞同。看来还

是我自己动手打姓曹的吧，胜败都不管，什么与广东合作，算啦！算啦！！”

我慢慢地跟他解说：“报上的消息完全是安福系造的谣，目的是破坏粤奉合作，耍的是挑拨离间之计。李少白在桂林根本没提过什么大总统问题，这样的大事，他没向大帅请示，敢自作主张吗？”当年的官僚政客常玩这一套把戏，张作霖也不是毫无经验的，一经提醒，他才恍然大悟，连连点头说：“有道理，有道理！”于是我又说明：伍朝枢久居上海，两广的情形他并不熟悉，现在已不是那个样子了。李少白刚从那边回来，只要问问他就明白了。孙先生还托我转达一点意见：“革命党是不怕失败的，因此这回讨伐直系由我们先发动，奉天只要扯扯后腿就行了。因为我们失败了，还可以再干，不要把雨公一生事业给毁了。”张作霖听了颇感动，态度立刻变转过来，毫不迟疑地决定，“我也派兵出关”，要我密报中山先生。

1921年4月，国会非常会议集会于广州，选举中山先生为大总统。中山先生旋驻节桂林，准备亲率大军北伐。但是，内因粤督陈炯明与直系勾结从中阻挠，外因湘督赵恒惕不肯假道，拖到1922年3月，中山先生乃免陈炯明职，移大本营于韶关，改道北伐。5月，中山先生誓师出兵，战事进展顺利。不料陈炯明在广州叛变，8月中山先生始脱险至沪。北方，自1920年7月直皖之战，直系战胜皖系后，就形成了直奉两大势力的直接、正面的冲突，1922年4月爆发了第一次直奉大战。由于张景惠的驻北京的两个师，未经正式开火就被直军全部解决，奉军又节节失利，终于败退关外。

张作霖倒不气馁，也不怪中山先生。他说：“那边有个陈小子，这边有个张杂种，坏了事。胜败乃兵家常事，算不了什么。不过孙先生是文人，带兵是为难的，我不求他别的，只要他对救国大计多想办法，这班家伙让我来用武力收拾他们！”

中山先生平安到沪后，张作霖找我去说：“宁孟言，我要在患难中交朋友。我不写信，信也难写，你就代表我去探候孙先生，请他到东北来住。”我晋见中山先生转达了张作霖的邀请。中山先生要我婉言代为辞谢，思索了一会又问我：“你能不能给张雨亭去电报，商借一笔款子？我有了款子，不出数月就可以消灭叛逆，收复广东。”我同意回去后，见机行事。中山先生也认为妥当，并给张一封致谢的信，暗示他如筹到款，即可戡平叛乱。张作霖见到我，先问孙先生的生活情况，我老实告诉他，经济很困难。他又是那句老话：“患难中交朋友。好！我送孙先生10万元作他的生活费用。回粤平乱问题，请他派代表来详细面商，你去发电报。”同时，就韩麟春赴杭州拉拢浙督卢永祥之便，带去赠送中山先生的10万元。

我把中山先生派汪精卫、路孝忱为代表的回电告知张作霖，他兴奋地说：“汪精卫我也久仰了。我想隆重地招待他们一下，表示重视孙先生的代表，做给日本小鬼看看。这差事就交给你办。”汪精卫、路孝忱来了。在将军府大厅欢宴，张作霖身着大礼服出席招待，邀请各界人士参加，主人客人都讲了话，真是个盛大的宴会。几度商谈，张作霖同意帮助粤军回粤军费50万元，由许崇智派其兄许功武来奉领去。以后，又陆续补助过几十万元，确数现在记不清了。

在这里要附带一提的，汪精卫曾带来中山先生给我的亲笔信（解放前已交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保存）。杨宇霆坚持要将这信送大帅一阅，我也同意。因为信内有“此次派精卫、孝忱来奉，已面嘱他们，关于军国大计，未得吾兄同意之前，毋许作自我活动”的话，我想让张作霖知道，心中有数，可以防止他们的私人活动。而杨宇霆因信内有“雨公所赠3万元，我已分给各同志矣，烦代致谢”的话，想借此怨韩麟春一下。果然，张作霖痛骂了韩麟春一顿，并说：“凭我张某人只送孙先生这点钱？不成话，赶快再补7万！”